

邓小平的故事之五

5

在总书记任上

魏 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247.8
954.5

《邓小平的故事》之五

在 总 书 记 任 上

魏 明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李和文
王立新
林枫叶
许海生
刘君立
梁林刚
陈 璞

魏 明
郝玉茹
李晓芬
张繁玲
夏 阳

汪秀川
谢 剑
傅文卿
曾又红

目 录

同高、饶的斗争	1
权责分明的财政部长	7
第三次出任中央秘书长	11
不能这样对待斯大林	15
毛泽东的评价	19
“我们不赞成这种大民主”	23
“连 19 块钱的权都没有，不像话！”	28
为刘伯承说话	32
“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	37
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	40
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	43
舌战赫鲁晓夫	47
白旗？锦旗！	52
举重若轻	56
“看吧！我们边看边谈嘛！”	59
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63

逛商店、赶庙会.....	67
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71
吃水不忘挖井人	76
上庐山	79
“我这个总书记也有责任呀”	83
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87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91
“邓小平真是太沉得住气了”	95
“一锤定音”.....	100
“我要看你们要干的”.....	103
“现在买东西都要票证,苦了老百姓!”.....	107

同高、饶的斗争

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随后又兼任财政部长一职。到中央工作不久，邓小平便经受了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即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考验。

50年代初，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中央工作，并调整、增设中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继1952年7月邓小平由西南局到中央工作后不久，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离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11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且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赴京后，他除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外，又由中央安排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赴京的日期是1953年2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赴京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应该说，当时高岗、饶漱石是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由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满。进京不久，他就开始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积累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于是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场所。他们和极少数追随者利用这次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会上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

在1953年9、10月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极力配合高岗的行动。他未向党中央汇报便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欲以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

在这场严峻的党内斗争面前，邓小平始终坚持原则，同高岗、饶漱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到中央工作之前，邓小平同高岗、饶漱石的接触和交往并不多。到中央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他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国家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岗、饶漱石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高岗、饶漱石为了搞垮刘少奇和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他们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当时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

1953年底，在党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

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调整。高岗、饶漱石闻讯后更加紧了其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并以更高的官位相利诱，以求取得他的支持。

在关系到党的团结的人是大非面前，邓小平丝毫不为高岗各种诱惑所动，断然拒绝了他的拉拢，并及时把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事隔二十多年后，邓小平于1980年3月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的谈话中，回顾他所亲身经历的这场党内斗争的情景时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

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和陈云的这一行动，可以说是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发现了高岗、饶漱石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在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他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求调换一些政务院副总理。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的事实被揭露。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

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在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邓小平充分表现出了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优秀品质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深得毛泽东的器重。1954年，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权责分明的财政部长

1953年9月18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二办副主任的邓小平又被委以重任——兼任财政部部长。到1954年9月离任，他在财政部主事只有一年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他那责权分明，果断干脆的工作作风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到财政部走马上任，正值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以后不久。在不久前召开的那次财经工作会议上，重点批判了修正税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财政部的一些同志也受到了点名批评。所以那次会议后，财政部的大多数干部说话办事都比较谨慎小心。

邓小平到财政部后，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财政部党组几个人谈话外，一般情况下都是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他在同副部长们的接触中，觉察到了财政部弥漫的那种小心翼翼的紧张气氛，感到他们在工作中有些束手束脚。有一次，他对副部长戎子和说：子和，我看你受了批评以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

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

在一次部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说：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

邓小平的这番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一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财政部的每个副部长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从不随随便便，而且心情也格外舒畅。而且，邓小平听汇报时，总是要求反映的情况真实、确切，数字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也是十分严肃的。他多次对财政部的同志说：人家批评我们财政部，如果批评对了，我们就要接受；如果批评得不对，我们要及时作解释，弄个水落石出；不要因为人家批评得不对，你又不作解释，结果等到问题成堆，有朝一日和你算总帐的时候，你就无法搞清。那时，由于业务上的关系，财政部的一些同志和同他们很熟的同志在往来事务交涉中，有时爱互相开些玩笑，有时还说些相互批评甚至挖苦的话。邓小平知道后，对

有些批评十分重视。他时常认真地询问知情的同志究竟人家为什么这样批评，批评得对不对。并要求他们查明真象，弄清事实，再报告他。后来，当这些同志告诉他，他们平时关系很正常，这些话只是随便讲讲，并没有其他意思时，他才不再追问。

1954年1月13日，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六条方针是正确的。但那时戎子和对第三条的后半句，即结余不上缴，有些不放心，怕地方各单位留多了影响中央预算。邓小平看出了戎子 and 的顾虑。一次，财政部党组讨论和征求对六条方针的意见时，在座的六位副部长有五位都说赞成。邓小平问到戎子 and 的时候，戎子 and 如实地讲出了他的意见，说有半条不通。邓小平立即说，我就知道你有些想不通。因为在战争年代，戎子 and 曾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了约8年的时间，邓小平知道他的脾气：凡是他想不通的问题，从来都是向领导说心里话，不说假话，而且是不会马上改口的；但一经会议或领导决定，他就坚决执行，不讲二话。事隔多年，邓小平仍记得戎子 and 的这一脾气，这使戎子 and 深受感动。

邓小平还非常善于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财政问题

的指示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1953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一天,邓小平特意找到戎子和,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戎子和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邓小平听后,沉思了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1954年6月,邓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

由于邓小平的正确领导,财政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效地发挥了它的各项职能。1954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总收入为262.37亿元,超过预算13.15%;总支出为246.32亿元,完成预算的98.74%;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企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1953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第三次出任中央秘书长

1954年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邓小平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出任该职。这一年，他整整50岁。

邓小平第一次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是在1927年12月，当时他只有23岁。后来他曾风趣地说，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过那时的工作环境十分险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也正是为了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他由邓希贤更名为邓小平。邓小平的名字，从此一直沿用下来。如今，它已成为20世纪最响亮的一个名字。

1934年底，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年30岁。那时，长征刚开始不久。1935年1月，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40多年后，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

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而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他得以充分施展自己在领导和组织等方面的才下，开始了他更为光辉的历程。

邓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这时，虽然没有了地下斗争时的险恶和长征途上的艰难，但身为领导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执政党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是非常沉重的。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外交、文化教育，等等等等，他的工作无所不涉及。他协助党中央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

这时，除了任中央秘书长一职外，邓小平还身兼数职。他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共 33 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是以周恩来为主席的由 24 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委员会秘书长。他还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选举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邓小平等 10 人被任命为中华人